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創業精神

喬治・紀爾德 著 劉國鴻 譯



創業精神

著 者：喬治·紀爾德

譯 者：劉國鴻

發行人：錄拾壹

出版者：長河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535號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351 號 3 樓

電 話：(02) 7636907 7666864

郵 撥：0165123—3 號

印刷者：啓示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4年5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 平裝160元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喬治・紀爾德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研究員，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雷根總統演講撰稿員。四年前，他出版「財富與貧窮」一書，締造了暢銷記錄，華府幾乎人手一冊，被譽為「華府的聖經」，是供給面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劉國鴻

台大社會系畢業，哥倫比亞大學企管碩士。曾任職美國美林投資公司、中華民國資策會資深規劃師，現任柏克市場研究公司合夥人。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創·業·精·神

喬治·紀爾德 著 劉國鴻 譯

譯序

這本書的宗旨是要闡明兩個觀點：一、供給面（企業家）對經濟活動的貢獻。二、一些阻礙企業家活動的因素。

作者舉例說明企業家如何突破困難，堅持目標，由無生有：從食品加工業的辛浦拉、石油瓦斯探勘的馬斯特斯、污水處理的克羅夫塔、設計記憶體的柏金森，以至於原來一無所有的古巴難民和從戰後廢墟中站起來的日本工業家，每個人都經歷過挫折和失敗，然後才得到成功，變成巨富，同時也為社會帶來了財富，增加了就業機會。雖然他們奮鬥的目標在於證明自己的觀點——錢倒不是主要目標——但由於他們的成功，經濟才得以進步，社會大眾才從而得益。當然生財也另有大道——就像柯布蘭玩弄財稅漏洞一樣，但這種發財的方法對於社會經濟實質上並無貢獻。

企業家本來可以對社會更有貢獻，但他們在累積了一點財富之後，就必須把創造發明的精力放在藏匿財富——逃稅或庇稅方面。如果減低他們的稅率，則他們就可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而實際上繳給政府的稅金總值（而非稅率）並未減少。

這種「減低稅率，增加稅基」的優點，可以從稅率和經濟繁榮史之相關情形得到印證。就如同一時期而言，稅率較低的國家其經濟成長率普遍較高；而就同一國家而言，則稅率較低時期的經濟成長率較高。意圖以高度累進稅率來重新分配所得的做法，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使窮人的負擔更重。稅率方面的差異使得日本和英國這兩個基本形態相同的國家，一個愈來愈繁榮富強，一個愈來愈衰敗貧弱。到底我們是想要那遙不可及的「各取所需」，使經濟停滯不前，還是面對人性而「各取所值」，使經濟日趨繁榮呢？

作者認為，自由主義者（或左派）把經濟活動當作一個靜態的對象來衡量研究，導出的結論和方法也使得經濟靜態（遲滯）下來。經濟生活之中除了數量因素之外，還有品質因素：生活品質的提高是不可能用鋼鐵產量的噸數來表示的。

經濟的原動力既然在於創業精神（個人），則扭曲創業精神的枷鎖應是愈少愈好。作者舉例說明，所謂政府的工業政策（日本及美國），實際上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有功勞：政府精心輔導貼補的大公司在創新方面總是落在小公司後面，而高瞻遠矚的日本通產省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在工業上的突破已經產生之後才付諸實施的。最好的工業政策實際上是財

稅政策——以低累進稅率讓精明能幹、勇於冒險的企業家（並非理財家）能夠儘快累積資本，用這些資本再去創造財富。在這些企業家創造財富的過程之中，就業機會得以增加，而他們創造財富的結果則使得稅基得以擴大。政府的歲入並未減少，而窮人（廣義，指中產階級以下）的稅負得以減輕，又何必一定要視高所得者為寇讎呢？要想達到資本主義的繁榮經濟，又不想允許資本家存在。「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做得到嗎？

人類社會應該有個理想，達到理想應該有些步驟。不可能在某一階段達到的理想，就這個階段而言就是空想，不切實際，癡人說夢。暴虎馮河，我不為也，為長者折枝，吾所能也。性善性惡，或者尚無定論，人性為己，却是不爭事實。如何善導人性而不揠苗助長，才是達到理想的正途。作者在本書之中談的不是經濟學，實際上已進入了經濟哲學的領域。

原序：企業家

對資本家完全不信任和不了解，是使目前流行的資本主義窒礙難行的主要瑕疵。由於購買力的循環流動、市場受「看不見的手」所操縱，以及財貨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使得所有的現代經濟學就像一齣龐大的數學戲劇，處於精巧的理論階段，尚缺乏一位主角來演活這一齣戲。

目前流行的假設是，無論在任何時期，經濟問題都僅有少數的解決方案——受到人們的偏好、技術，以及天然資源的限制——這些解決方案可用一組聯立方程式來表達。在這種假設之下，資本家或者企業家的公認角色就是要周旋在所有限制條件的邊緣。甚至學術上的主要鼓吹者也僅是把他當做「機會的探索者」、價格的傀儡，或至高無上的消費者的僕人。企業家被當作一個相關變數，很快的就被土地、勞工，及資本等生產的重要因素，以及貨幣和

總體需求等龐大的數字陰影所淹沒。

令人意外的，馬克斯主義者却提出比較堂皇並且在某些方面比較精確的看法。馬克斯（Karl Marx）本人承認資產階級卓越的生產天才，並且承認資本家在經濟進步中的中心（雖然是過渡性的）角色。但是，左派人士却把資本家幻想成揮舞着企業權力的一小撮傑出大亨，而不是由企業家和胸懷大志的商人所組成的一個龐大階級——單單在美國就可能有三千萬人——幾乎是有工作能力公民中的多數。

然而，馬克斯對於資產階級之動態和創造力的理論，却比亞當·史密斯的觀念正確。亞當·史密斯把經濟當做一個暗中受到導引的大「機器」，而資本家只是「市場」的工具。甚至今日的通俗馬克斯主義仍舊保留其原有特色，承認商業所扮演的創造性角色的重要性。問題在於，左派人士認為商業的力量在精神上和目的上，是邪惡而自私的。

甚至在右派人士的眼中，企業家也是屬於道德低下的一群。流行的保守觀點使企業家免於被左派指為工人的邪惡剝削者，但也只把他當作辛勤追尋個人利益的人。亞當·史密斯有時主張「利己會變成利他」、「貪婪會帶來繁榮」。然而，他那「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却把企業家視為慾望的盲目工具。他們除了自己以外還關心他人，但僅僅是爲了找尋他人慾望的訊息而已。

根據史密斯的看法，資本家僅僅是因爲「奢侈和任性」——他對於「偉大經濟中各種不

同的小東西小玩具」的欲望——才使窮人「分到一份生活上的必需品，這些東西不能指望經由企業家的人性和正義感而得到。」在可能是史密斯最有名的幾段話之中，他把資本家描寫成：「不管他們天生自私和貪婪的本質，雖然他們只是爲了本身便利，雖然他們僱用千萬勞工的唯一目的，是他們本身虛榮心和難以滿足的欲望之滿足……他們都是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並非意圖如此，也不知道實際情況，就增進了社會的利益。」

史密斯的看法指出了這種經濟體系的本質和缺點，對以「國富論」爲知識生活中心的我而言，是一種貢獻。做爲資本主義的評論者，左派人士僅僅提出了史密斯對企業家的模糊看法，却不提市場的奇蹟。對於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士而言，右派接受史密斯的市場理論，但有時却避而不談他對企業家的攻擊。雙方都採取了英國輕視商人的同一知識傳統。遍查所有的經濟學典籍之後，我們最多只可能爲商人辯護說，雖然史密斯使我們不能從商人的天性中祈望任何事，但是凱因斯（Keynes）確實從商人的「動物精神」之中看到一些優點。

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理論的問題，均在於他們科學上的愚昧。即使我們不要求經濟學家表現得有如道德哲學家一樣，我們也應該要求他們精確的觀察這個世界。如果一個人觀察這個世界，他可以看到目前有關企業活動的流行看法事實上沒有什麼根據。資本家不僅僅是資本、勞工和土地的依靠者；他還界定並創造資本，使土地價值增加，並且貢獻自己的心力來提高他人無組織的勞動力效果。他不是市場的工具——他是製造市場的人；他不是搜索機會的

人——他是發展機會的人；他不是使資源發揮最大功效的人——他是發現資源的人；他不是現存需求的反應者——他是引起需要的創新者；他主要不是技術的使用者——他是技術的生產者。他不是市場不平衡、選擇不確定，以及漸進的進步等等有限的範圍中運作。微小的改變不需要企業家來做；甚至一個律師或一個政府人員就可以做得到。

在他們最有創新性和最有利的角色中，資本家尋求壟斷的地位：獨特的產品、令人驚異的新形式、行銷的突破，以及新奇的設計。這些冒險打亂了現存的平衡，而不是把外界力量錯誤造成的平衡予以還原。由於他們可以藉著改變技術的新領域來重新塑造社會大眾的欲望，企業家可能比藝術家和作家更不受偏好和技術的限制——後兩者普遍被認為有極多自由。因為企業家必須和別人共同工作，和別人共享光榮，並且為他們生產，他們比其他有創造力的人有更不自私的傾向，經常把快樂和自我表現當作他們的最高目標。

在社會的經濟和道德帳冊中，如果缺少了這些重要而有創造力、倔強而自我犧牲的人，則資本主義文化將殘缺不全、士氣不振。這將導致他們無法把他們豐富的致富概念以及生命的各種機會傳給許多年輕人。這將使得知識份子存有一種幻想，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中。這將使一般人普遍認為他們應該享有社會的富裕、「社會的剩餘」，而這種富裕和剩餘事實上是某些特別的男人和女人的勞力和天才的產物。企業家使社會得以維持，並且僅僅享用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中的一小部分，社會永遠虧欠這些人。但是像奧提嘉（Ortega-

gay，西班牙哲學家）在「大眾的反叛」一書中所敘述的野蠻人一樣，許多西方人直覺的認為他們天生應該享有：自然而無可避免的舒適生活，而其中困難之發生則是領袖之邪惡性質所造成的後果，好的事物或者來自「看不見的手」，或者來自空洞的社會辯證法，或者來自外部的科學，但不是來自企業前線的男女的特殊努力和犧牲。

這些人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一點也不抽象或不可以預測。他們有些人是科學家，有些人是藝術家，有些人是手工藝家；但大部分人都從事商業。雖然他們是以個人的身分從事各種活動，但他們幾乎永遠被熟悉的角色和責任所驅使。他們並不是永遠溫和或有節制，很少人是高雅或者身材高大，僅僅偶而能言善道或者很明顯的是眾人的領袖。有些人逃離他們的家園和親人而遠赴異鄉——因而想要以事業上的奮鬥來克服或者證明這種損失是值得的。許多人因為本身是移民，自願尋求孤兒一樣的命運，並且辛勤工作來建立一個王國。有些人失去了他們的父親，在早年就要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而後來就把這種角色在生活中變成榮耀。他們化醜惡為美麗；他們將粗野和無情變成善良和真誠。他們大部分人無家可歸，流亡國外，在母親撫養下長大，為社會所遺棄，或者具有好戰的個性，他們很早就從生活中學到教訓，認識了痛苦和奮鬥過程的狂喜。

他們在痛苦的生活，發現了所有人類生活中的困境，總是受到叢林和砂地蔓延侵害的威脅。他們從失敗的知識中塑造了成功。在承擔風險中，他們為所有的人找到了安全。在擁

抱變遷中，他們確保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

這些男人和女人——他們所看到的文明不是自然的或者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每週工作四十個小時中緩慢的興衰更替，他們知道在世界的帳戶之中保持淨利是一個重要的目標——這些男女就是企業家。

當生於安樂的孩子們抱怨沒有什麼工作值得做的時候，這些企業家却同時兼作三個工作；當生於安樂的孩子們把每天九點到五點的工作當作重擔之時，這些企業家却在天明之前就已經起床，並且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九點快樂的工作；當生於安樂的孩子們抱怨成功來自「和權貴的人情關係」——並且談論「權術」的挫折感——之時，企業家却把權術置之腦後，而和工人及顧客接觸；當生於安樂的孩子們把失敗當作災難，而成爲一項辭職的原因時，企業家却把這些失敗當做刺激他們邁向新奮鬥的動力。

當生於安樂的孩子們認爲財富屬於賭徒或吝嗇鬼、屬於那些有天份或者有良好關係者、屬於那些剝削勞工或者有政治關係者、屬於那些有特殊才幹或者土地者、屬於那些擁有自然資源或者擁有非自然的「運氣」者之時，企業家却知道天才就是血汗、勤勞和犧牲，而自然資源只有在付出辛勤、絞盡腦汁之後，才會增加其價值。

那些終日裝飾自己的將軍、政客、官僚和革命份子們——還有他們在學術界和新聞媒體中所顯出的光芒——助長了目前流行的看法：認爲歷史的進步是經由選舉、戰爭、公衆集會

，以及好戰運動而來的。這些事件雖然都很戲劇化，但主要是由於它們增進或阻礙企業家的創造性工作，而對世界的未來具有長期的重要性。

創造財富之人主要是企業家，而政客們則在企業家的成果之上搔首弄姿、互相鬥爭。當資本家受到阻礙，迫入歧途或受到驅逐時，將軍和政客們，游擊隊頭子和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總是驚異的發現，偉大而實際的生產工具——這種受過考驗的自然財富資源之象徵——很快就成了一大堆破銅爛鐵，一堆廢墟，糾纏成一團的鐵絲，甚至成爲一片荒野。所謂的生產工具，在缺乏具有生產創造力的人——企業家——的引導之下，是無法再產生財富和進步的。

只有企業家了解世界的規則和神的法律。他們使世界可以生存下去。在他們的事業之中，沒有所謂最佳的估算，也不在乎市場微妙的平衡。他們推翻現存體制，而不是保持均勢。他們是經濟生活中的英雄。這本書是爲他們而寫的，希望世界上生於安樂的孩子們能夠看到並且追隨他們的榜樣，努力工作以獲取他們的救贖和快樂，並在人類永遠不變的生活領域中，將工作和冒險合而爲一。

